



辛德勇访谈
推动历史学回归社会
让更多人能读懂学术

记者:您的个人公众号除了学术探讨,也会分享一些生活化的内容,有人觉得这很亲切,也有人给您贴上“网红教授”的标签,您怎么看?

辛德勇:传统专业期刊真正触及的读者面很窄,而开通公众号能够面对更多受众。起初我只是偶然尝试,后来发现,新媒体平台与读者的沟通更及时、更便捷。比如,一些我长期关注的领域有了重大考古发现,我就可以通过网络第一时间发表个人观点。当然,作为学者,我有底线:我公开发表的每一个学术观点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复杂论证的,不会不负责任地随意发言。

至于“网红教授”这类说法,我并不介意。人文研究是有门槛的,需要系统的学术训练。网上有些言论并不是严谨的学术探讨,只是为了个人的存在感而随意发表观点,没有实质的讨论价值。

记者:您说过“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之中,从来没有神”,这句话是不是对应着您的观点——不要盲目崇拜名人?

辛德勇:是的,对任何人都一样,包括我自己。学术是由一代代学者艰难向前推进的,一个人一生若能提出若干重要见解,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前辈学者也存在局限性,就算他们的观点出现错误,也不代表要全盘否定这个人。怎么做到不盲目崇拜?就是即使面对令人尊敬的学者提出的观点,也要先通过正确的方法,进行自己的思考和验证。尊重前辈和在学术上提出不同意见二者并不矛盾。如果发现了错误,就应该去分析前辈学者在研究方法、材料使用上存在的不足,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包括我自己的研究成果也一样,比如我上一本书《天历探原》,目前看有个别小小的错误,对此我不会回避。

记者:您的书专注于学术研究,但读起来并不晦涩,能吸引许多非专业读者。这种写作方式是如何炼成的?

辛德勇:有多方面原因。一方面,学术写作有自己的一套体例要求,这的确会影响学者的文风。我并不是专门向学术期刊投稿,所以写作上就少了这一层束缚。另一方面,在北京大学教书的经历对我影响很大,讲课要口语化、讲明白道理,长期下来就改变了我的文字表达习惯。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2016年《海昏侯刘贺》出版后,我意识到,尽管书中涉及的是较为晦涩的历史学问题,但只要文风稍显轻松,便能吸引圈外读者。我开始思考,我们做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由此提出了“让历史学回归社会”的观点。学术研究不应只是小圈子内部的自娱自乐,有条件的話,应当让更多人读懂,并愿意来了解我们的研究成果。当然,这对研究者的综合素养提出了较高要求。写专业论文时,我们只管专注自己的研究部分就行了,无需对领域内已形成共识的基础概念与前置背景做过多赘述;但要是写给普通读者看,就得把前因后果讲明白,把必要的背景知识交代清楚。

(图片由辛德勇提供)

辛德勇 破解青铜器纹饰密码



辛德勇

1959年出生,辽宁铁岭开原人,历史学博士,中国史学会历史地理研究会会长。出版《隋唐两京丛考》《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制造汉武帝》《铸造天帝》等著作。

■ 记者 田莹

10月5日,历史学者辛德勇来到天津,参加“第二届海河阅读季·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并作了以“梦”为主题的文学讲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聊起自己的新书,由北京“鼎之文化”策划、现代出版社出版的《铸造天帝》。对于青铜器纹饰,他默默关注了二十余年,读书、查图录、做笔记,只是一直未曾动笔。直到2021年4月,他到位于河南省巩义市的双槐树遗址参观,终于找到关键证据,激发了灵感,于是诞生了这本书。

研究青铜器的纹饰
只为找出历史真相

历史学者研究青铜器纹饰,似乎多少有些跨界,而辛德勇却不这么认为:“早年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下设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三个专业。多年后,考古学专业才分出来单独建系。历史学和考古学在研究的方法、使用的手段、关注的重点等方面都有不同,但实际上,我们都是为了探求历史的真相。”

辛德勇最初研究的是历史地理学,与考古学的关联更紧密。“在中国的考古学中,新石器时代考古一直是重中之重。因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主要在这个阶段,再加上清晰的文字史料很少,考古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辛德勇进一步解释说,“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梳理文化区系,也就是现在大众熟知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这些概念。它们除了代表一个时期,更体现了一个地域文化单元。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中心区域,向外扩散,和周边的其他文化碰撞、融合。在我们看来,这也是历史地理的问题。”正是出于这种学科内在的关联,辛德勇长期保持着对考古学的关注,商周青铜器自然进入了他的视野。

商周青铜器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瑰宝,自北宋以来,诸多学者便对其展开了系统的著录与研究。清朝末年,大量青铜器流散海外,藏于许多著名博物馆内。当代学者对金文的研究不断深入,也专门从形态、花纹的演变去研究青铜器,器型谱系逐步建立。

辛德勇在《铸造天帝》的自序中提及,自己对商周青铜器并没有精深研究,只是数十年来始终怀着求知的渴望,用广博的阅读来填补自己知识的空白。

从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吕大临的《考古图》,到近现代以来,容庚、陈梦家、张光直、马承源等青铜器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留下的相关著作和文章,该读的辛德勇几乎都读了。他看得最多的,是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马承源主编的《商周青铜器纹饰》,“这类图文并茂的学术专著价格不菲,买得起的我就买,买不起的就借,尽量至少浏览一遍。”

2004年,辛德勇调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系里安排他给本科生讲“文史研究基本知识”。设计课程时他认为,天文历法应是其中重要内容,自己在读硕士时有所涉猎,于是借此机会边学边讲。他说:“在授课过程中我逐渐有了一个判断,古人夜观天象,看斗转星移,发现整个星空都在围绕着一个看不见的轴旋转,我将其称为‘天极’。在我看来,殷墟卜辞中反复出现的‘帝’字,正是因天极崇拜而产生的信仰。”

研究商周青铜器无法绕开殷墟卜辞,它是商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占卜文字,是商代人留下的第一手文字史料。“郭沫若、陈梦家在文章中也指出过,殷墟卜辞中的‘帝’正是华夏先民崇拜的对象,但具体是什么形象,他们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辛德勇认为,华夏先民使用野猪象征天极,青铜器纹饰中最著名的“饕餮纹”描绘的正是野猪,“这是我的推测,因为没有扎实的考古证据,所以一直没落笔。我需要一个实证,作为这一推测的支点。”

研究古代天文历法
发现新的观察角度

证据的到来纯属偶然。2021年4月,北京大学历史系一位老领导邀辛德勇赴河南省郑州市,参加一场关于黄河文明的主题讲演。结束后,主办方带大家去双槐树遗址参观。辛德勇对此颇感兴趣,因为此处遗址出土过一组被刻意摆放成北斗九星形态的陶罐,恰好与古代天文历法相关。

在现场,辛德勇惊讶地发现,正对这组陶罐北斗斗魁的位置,有一具猪的骨骸。“当时我甚至听到了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他回忆说。《史记·天官书》记载“斗为帝车”,古人把北斗视作天帝出行乘坐的车驾,斗魁便是车厢,车厢位置的猪骨,不就是代表了乘车的天帝吗!这恰好印证了他多年的猜

想,令他激动不已。

2025年春天,辛德勇再次来到双槐树遗址,经由郑州大学同行牵线,见到了当年亲身参与发掘工作的老技工。他说:“考古讲究地层关系,只有两件遗存处于同一地层,才能证明它们是古人有意布置的组合,而非后世偶然叠压在一起的。那位老技工向我确认了陶罐和猪骨确属同一地层,还告诉我:陶罐上面有厚实的夯土层,土层上建有房屋。这显然带有强烈的象征寓意,绝非随意堆积。”

饕餮纹究竟代表什么呢?这个话题已被讨论了上千年。殷墟卜辞中只留下了“帝”祭祀的记录,却没有对其样貌进行描述,那么就只能到同时代的图像遗存——商周青铜器纹饰中去寻找,辛德勇认为,作为祭祀用的礼器,“帝”的形象理应在上面。

双槐树遗址的猪骨给了辛德勇一个新的支点。他说:“考古学家俞伟超曾把各类已辨识的神、兽形象排除后,认为占据商周青铜器核心位置的饕餮纹,极有可能就是代表殷人信仰的神。而饕餮纹这个说法,主要源于战国末年《吕氏春秋》中记载的‘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其时代距商周七八百年,本质上是后人的推测,不能算作商周时代纹饰的原生定名。”

辛德勇锁定了纹样中一个醒目的特征:它有一对向外翻翘的獠牙,而野猪的獠牙同样也是裸露在外,辨识度很高。他翻阅历代金石图录,发现很多被归为饕餮纹的铜器纹样,无论造型如何变化,大多保留着这对“獠牙”。结合双槐树遗址考古,辛德勇推论出:饕餮纹的原型就是野猪。

除了饕餮纹,《铸造天帝》中还对几种青铜器纹饰做了有趣的解读。这些研究都是由同一件青铜器引出的,即日本泉屋博古馆所藏商代晚期青铜器珍品“虎食人卣”。

“所谓‘虎食人卣’,通俗地说就是‘老虎吃人’。我对这件青铜器的印象一直是那个坐在老虎口中的小人儿神态十分安详,并不像要被吃掉的样子。但后来我得到一本泉屋博古馆的藏品图册,随手翻看,发现这只老虎的头顶竟然还铸有一只鹿。它的出现让我兴奋起来。”辛德勇说。

鹿这个意象,让辛德勇想到位于河南省濮阳市的西水坡遗址曾出土用蚌壳摆出的龙、虎、鸟、鹿四个动物形象。按古代天文历法,东方青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黄鹿,分别代表春夏秋冬四时。那么,“虎食人卣”上面有虎、有鹿、有龙纹,几乎可以确定其代表了天文历法的形象,但是,鸟在哪里呢?

在寻找这只鸟的过程中,一段段史料和一件件文物在辛德勇的大脑中不断汇聚、重新解读,最终得出一张完整的拼图:青铜器上常被忽略的构件扉棱,正是鸟纹的变体。殷墟卜辞中有“帝史风”的记载,殷商人认为凤鸟是天帝的使者,和天帝一同出现在礼器上,并不奇怪。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收藏的战国“兵辟太岁”铜戈上,那个一手执鸟、一手握龙的人像,正是古代天文历法虚拟出的“太岁”。许多青铜兵器上都有太岁纹样,也有与扉棱相似的图案,甚至更真实的鸟纹。因为殷人相信,凤鸟能趋吉避凶,将其铸在兵器上可以帮战士驱避灾厄。

构了“宝水”这个村庄的名字,当时我想,全国各地一定会名叫“宝水”的村子,很想查一查,但忍住了没查,因为我怕查了之后就想继续去找更多具体的信息,怕限制我的写作思路。一直到写完这本书之后,我才去查,果然有好几个村庄叫“宝水”。

回去的作家大多是城里人,不太懂乡村,参观时,看到玉米棒子明明熟了,却并没有被摘掉,满心疑问。我说,应该为了留种子,要等水分干了,可以成为种子了,才能摘。村干部给我挑大拇指,说还是你懂。

年轻时我懂很多乡村的知识,但我更愿意懂洋气的知识,不想写得土气;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觉得,了解乡村是一件让我自豪的事。生活本身就是“宝水”,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形式的“宝水”,生活、爱和故乡,都是滋养我们的“宝水”。

时间是物理概念
活着是生理体验

《最慢的是活着》是我在2007年写的中篇小说,在2010年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这个小讲说的是祖孙关系,题目来自云南诗人雷平阳的诗。小说快写完的时候,我还在想题目,正好读到他的诗,“最快的是死去,最慢的是活着”。我觉得这太适合这篇小说的气质了,跟他说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拿去。

我想表达的是,时间是一个物理概念,而活着是一种生理体验。当你觉得特别难熬的时候,时间过得特别慢;当你觉得欢乐的时候,它突然加速了。这就是活着的感觉,它有一种生命力。有时候人受伤了、生病了,疼痛难忍,但这也证明了你在活着。活着是一件很

复杂的事情,但真的很美好,甚至疼痛也是美好的一部分。

人会慢慢老去,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也是一个特别幸福的过程。我前一段时间写童年往事,有人很含蓄地问我,你已经这么大了年纪了,再写童年的事情,会有隔阂吗?我说没有啊,写作有点儿像时光穿越,我想回到几岁,就能够回到几岁。读者阅读的时候也是一样,读好看的童话书,也会回到童年,读别人的青春故事,如果能够共振,也会回到自己的青春岁月。这时候生理上的年龄就不那么重要了。这是写作和读书能给我们带来的一种很大的“福利”。

我出过一本散文集,书名叫《要爱具体的人》,里面记录了一些平凡人,全是我在生活中遇到的人。记得有一次我去武汉做分享会,一个我年轻时的朋友看到通告,跑去看我。我们曾在郑州有过一段密切的交往,那时她经历了情感波折,常在深夜找我诉说。多年后再见面,可说的话很少了,但我们仍很亲密,因为毕竟共同度过了一段日子。分别时她送给我一条围巾,我们哭着拥抱了一下,我送她到电梯口。这样的事情没法升华出什么意义,但是令我久久难忘。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记录这个过程。我想到其实她不仅是在来看我,也是来看她自己,因为在每一个故人心里,都储存着当年的自己。很多读者喜欢这句话。

人生经历都是珍宝
个体经验无法替代

对我这样一个写作者来说,生活的重要性再怎么夸大也不为过。生活扑面而来,带来无数细节,但是,我们该如

何提炼?正如那句话,“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我想,只要是让我们久久难忘的,都可以写,因为这种难忘里面都有巨大的信息量,把内心复杂的感受如实地写下来,就是好文章。

我可以骄傲地说,我没有素材枯竭的时候,有太多有意思的东西要去写。我从来不恐惧没有素材,我恐惧的是我能不能把这个素材处理好。

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了神奇的感受,是大势所趋,但我个人是非常警惕人工智能的。我也用,用它查资料,让它像秘书一样,帮我快速梳理我想要的内容。但我也发现一个问题,人工智能软件对人有谄媚的倾向,总是顺着你说,有时候为了让你高兴,就哄你、忽悠你。所以我对它保持警惕,防止被它吞噬。如果把它比成一把刀子,刀柄要握在我们手中,要为我们所用,而不能拿这把刀来砍我们自己。

我们为什么要写作?写作不是为了说跟别人一样的话,而是为了说跟别人不一样的话。别人都这么说,你也这么说,就是话在说你;而对于会写的人,就是你在说话。所以如果你老用人工智能写作,它是公共工具,那你写出来的东西也成了“话在说你”。

创作有珍宝,我们经历的生活都是珍宝。同样一件事,很多人都在现场,但每个人的心理感受不一样,这就是不可替代的个体经验。每个人都有百分之百的生活,自己写,让人工智能当秘书,让它查资料,还可以跟它探讨问题,但不要把它交给它。如果交给它了,它慢慢当你的家、做你的主,覆盖你。我们守着自己宝贵的个人经验,交给这样一支公共的笔去写,是对我们人生的一种浪费。

口述 乔叶 撰文 何玉新

(图片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提供)

讲述

人人都可成作家 生活中有大文学

我们生活在字里行间

9月19日上午,“人人都可成作家,生活中有大文学”阅读分享活动在北京地坛书市举办。茅盾文学奖得主、北京作协副主席乔叶与文学出版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韩敬群对话,探讨文学与生活的内在关联。本场活动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在地坛书市推出的“地坛里的文学课”系列活动之一,也是第11届北京十月文学月的重要活动之一。

韩敬群解释活动的主题:“人人都可成为写作者,而写作者中的佼佼者才能成为作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做生活的有心人,注意观察、发现生活中包含的人与人的情感,思考我们与世界、与自然的关系。”

乔叶谈起2025年她在首都图书馆做讲座,题目也是“人人都可成作家”。“这个‘可’是一种可能性,太多的人有写作的欲望,有强烈的有话要说的冲动。不管是在自媒体上,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或者以什么方式,可能就说出来了,慢慢开始写作。这就是我们当下的大众文艺和‘素人’写作。”她还分享了自己的人生故事与文学感悟。

最偏僻的小村庄
也藏有精彩故事

我出生在豫北平原一个小乡村,隶属焦作市。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焦作就是“宇宙的尽头”。小时候没有什么书可读,语文课本就算是很好的文学书了。乡村的很多东西给了我生动的、朴素的、深沉的教育,让我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滋养。后来我不断回顾自己的心路历程,我发现,其实书有不同的形式,大地本身就是一张非常巨大的书页,我们就生活在它的字里行间。他们老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万里路本身也是万卷书。

韩敬群老师是我非常尊重的编辑大家,陪伴了我以及很多“70后”作家的成长。2012年,我写长篇小说《认罪书》,跟韩老师有过很好的合作。那时我还在河南工作,我们经常联络,他总问我在写什么,有什么好的想法。2014年,我动笔写《宝水》,韩老师在背后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提出很多特别好的建议和意见,给我推荐了很多好书,指导我的写作方向。《宝水》发表后的第一篇评论也是韩老师写的,题目是《生活是创作的宝水》,对我的创作给出精准的总结。



乔叶

在北京最西边的房山区蒲洼乡,有一个村就叫宝水村。前一段时间我们一些作家去那里采风,跟村民座谈,听他们讲村庄的历史。他们的言谈话语特别朴素,同时也特别自豪。早年间,这里因为有豹子出没,村子就叫了“豹水”,后来改叫“宝儿水”,又简化成“宝水”。

多年的写作经验以及对人世间的体察的经验告诉我,哪怕一个很偏僻的小村庄,也是一个很大的世界,里面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既平凡又了不起的人间故事。所以每当我来到这样的村庄,都会对它们充满敬意。

当时我聊起自己写《宝水》时的一些想法。但凡是山村的名字,都爱带一个“水”字,为什么?不是因为缺水,而是因为缺水。水是生活必需品,也代表了人们的一种向往。我虚